

跨文化交流中的经典译介：西维洛夫与他的《大学》俄译本

刘 淼

摘 要：19世纪上半叶，俄国汉学家西维洛夫开创了俄国首个汉语专业，为俄国汉学研究和中国文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儒家思想兴趣浓厚，留下了大量相关译著和研究成果。本文梳理和总结西维洛夫的汉学成就，聚焦西维洛夫《大学》俄译本的翻译与传播。研究表明，西维洛夫的两个译本均译自朱熹的《大学章句》（节选），其译文准确，语言精炼。尽管这些译本在当时未能正式出版，但它们后来成为了俄国大学汉语专业的基础性教材，为汉语教学的规范化、体系化奠定了基础，并有力促进了儒家思想在俄罗斯的传播，推动了中俄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西维洛夫 《大学》俄译本 跨文化交流 经典外译 儒家思想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西维洛夫（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Сивиллов，1798—1877年），俄国东正教大牧首，法号丹尼尔（Даниил），俄国第十届北京传教士团成员，汉学家，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首位负责人，教授，1837—1844年以修士大祭司的身份任教于喀山大学。西维洛夫毕生致力于翻译中国古代典籍，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其译作大多未能及时出版，而是以手稿形式保存下来。这些手稿在西维洛夫去世后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直到21世纪，随着中俄两国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俄罗斯的汉学家和史学工作者开始关注西维洛夫的学术遗产，着手整理和出版其翻译手稿，使更多读者有机会

了解这位杰出汉学家的优秀成果。

目前，俄罗斯汉学界和中国俄语学界对西维洛夫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深入阐释其学术思想和全面分析其译作的成果还较为匮乏。在西维洛夫的学术遗产中，受到更多关注的是他对《道德经》和《诗经》的翻译，如国内学者张西平、陈建华、俞森林、吴雪萌在研究中提及了西维洛夫在俄国汉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①。俄罗斯学者斯捷任斯卡娅（Л. В. Стеженская）^②、佩图霍娃（Н. В. Петухова）^③探讨了西维洛夫的道教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当代著名汉学家科布泽夫（А. И. Кобзев）于2011年在其专著《儒家经典与名家学说》^④一书中收录了西维洛夫的两个《大学》译本，为全面研究西维洛夫的学术成就提供了宝贵资料。通过阅读西维洛夫翻译的《大学》译本及其他相关文献，我们发现，西维洛夫的《大学》译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对先秦哲学经典的翻译亟待学界进一步发掘和研究。鉴于此，本文将聚焦西维洛夫生平、学术思想以及《大学》俄译本的翻译和传播，探究这位“被低估”了的俄国汉学家的学术贡献。

一、西维洛夫的学术思想

西维洛夫出生在俄国奔萨省戈罗季欣斯基县的克尼舍村，是一

-
- ① 参见张西平《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314页。另见陈建华《阅读俄罗斯》，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63页；俞森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88页；吴雪萌《英语世界老学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页。
 - ② Стеженская, Лидия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О несостоявшейся первой публикации русского перевода «Шу цзина».”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Философия* 25.2 (2021): 320–327.
 - ③ Петухова, Наталья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Развити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как науки в России в середине-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и африканистика* 4 (2014): 15–22.
 - ④ Кобзев, Артем Игоревич. *Каноны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а и школы имен*.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14.

名教堂执事的儿子。从奔萨神学院毕业后，他先考入了圣彼得堡医学外科学院。1819年，并不想成为一名医生的西维洛夫转到了隶属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神学院。于同年剃度成为修士，获得法号丹尼尔。1821年，他以财务监督的身份，在大牧首彼得（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менский，1765—1845年）的带领下，随第十届传教士团来到中国。在中国，西维洛夫不仅认真完成了传教士团的财务工作，同时在词典编撰和中国古籍翻译方面成果颇丰。随团返回俄罗斯后，西维洛夫被教会任命为莫斯科兹拉达乌斯托夫斯基修道院（Злагоусто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院长。西维洛夫从中国带回了大批的汉语和满语书籍，这些书籍引起了时任喀山教育区督学、俄国政治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穆辛·普希金的关注。穆辛·普希金刚刚为了支持喀山大学东方学研究去巴黎购买了相关书籍，他邀请西维洛夫到喀山大学任教，开创俄国大学首个汉语专业。西维洛夫接受了邀请，并将自己从中国带回的书籍作为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的第一批藏书。1837年，在穆辛·普希金和时任喀山大学校长、数学家洛巴切夫斯基的努力下，由西维洛夫主持的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正式成立，他一个人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汉语教学工作。西维洛夫在喀山大学共工作了7年，1844年，因健康原因，西维洛夫辞去教职，到远东的色楞金斯克修道院（Селенги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任职，为当地的布里亚特人传教。1863—1872年，西维洛夫调任罗斯托夫州的鲍里索格列布斯基修道院（Ростовский Борисоглеб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院长。1872年西维洛夫辞去鲍里索格列布斯基修道院院长职务，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后时光，直至1877年去世。

（一）西维洛夫的汉学成就

西维洛夫一生致力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他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学术和教学两个方面。在学术方面，他对中国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翻译了大量宗教哲学经典著作。其中包括：《四书》《道德经》《诗经》《尚书》《孟子》《明心宝鉴》等。这些译稿在他在世时均没有出

版，直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才陆续有一些得以面世。其手稿目前保存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喀山的多个图书馆和档案馆中。除译作外，他在中国期间还编撰了一些词典，如《拉丁-汉语词典》《汉语常用词词典》《法汉满成语词典》等。此外，西维洛夫还撰写了《中国儒释道三教简述》，该文对中国宗教哲学的根源和本质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在喀山大学任教期间，他仅有两部译著出版：《中国通史》（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主要译自明代张璁的相关著作）和《资治通鉴》（部分）。在教学方面，西维洛夫于1837年向喀山大学提交了《汉语教学大纲》（«Конспект для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下文简称《大纲》），这是俄国大学第一份汉语教学大纲。西维洛夫在《大纲》中阐述了自己对汉语语法、汉字、音调的基本认识，同时指出汉语中不存在西方人熟知的字母表，汉语学习应先从“关键符号”（ключевые знаки）学起。西维洛夫根据语法的难易程度，将教学分为口语（简单对话）和官话两个阶段。同时他还指出，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多音字，而且汉字的不同组合可以带来“令人惊艳”的语法和语义效果等。^①这份《大纲》对俄国大学汉语教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随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西维洛夫的继任者们都贯彻和使用了《大纲》里的大部分内容。除基础语言知识教学外，西维洛夫还编写了《中国文选》（«Хрестоматия Китая»），该书虽然没有得到及时出版，但一直是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乃至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的中国文学课教材，对著名汉学家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1868年出版的《中国文选》^②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二）西维洛夫的学术思想

1. 西维洛夫对儒家思想的研究

西维洛夫的重要贡献在于从思想层面和政治层面对儒家主要学者

① Хохл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итаист Д. П. Сивиллов и его русские переводы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ки.”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44.1 (2014): 505.

② Васильев,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Китай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изданная дл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студентов профессором В.П. Васильевым Т. 1-3*. Печатня М. Алисова и А. Григорьева, 1868-1882.

的经典著述进行了研究。他在《中国儒释道三教简述》中写道：“中国的哲学思想并不仅仅局限在哲学的范畴。根据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可将其称之为‘政治思想哲学或者政治学’。”^①

西维洛夫指出：“与中国哲学思想相关的著作非常多，其中最能体现这种政治思想元素的著作是五经，其中记载了统治者、士大夫、官员的治国理念，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和家庭生活的重要价值准则。而在所有的儒家经典著作中，最能给予中国人智慧和养分的是四书，它同时也是中国文人的必读书目。孔子是四书最初和最重要的作者。四书中记载了中国哲学的重要论述和核心观点，熟读四书是历代官员晋升的必经之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四书的辞藻华丽，韵律工整，其阐释的哲理既基础又深奥。”^②西维洛夫认为，孔子揭示了国家治理、家庭和谐、个人幸福的秘诀。统治者要富国强民，首先要进行自我修养，净化心灵，这样才能获得治国资格和个人幸福。而这种幸福在于提升民众道德，使其安居乐业。这种修养之道应从君主开始，向下推行，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应恪守伦理，父慈子孝，夫妻和睦；君臣应忠诚职责，君爱臣，臣忠君；师生应勤勉治学，互相尊重；兄弟应友爱互助，朋友应真诚相待。所有人都应遵循至善至理的思想，尊重长者、智者、善者。西维洛夫进一步评论道：“若国家和个人都能遵循这些原则，则国家必将繁荣富强，个人亦能获得知识、幸福、荣耀、健康与长寿。如果人们能够按照上述至善至理的思想原则生活（如中国人口中的君主之师或国家之师），那么国家就会繁荣富强，人民也会安居乐业。同样地，任何一个人如果可以秉持上述思想，那么他就可以掌握丰富的知识，完善自己的精神世界，从而得到全方位

①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СПб.) (РНБ). Отдел рукописей, ф. 608, оп. 1, ед. хр.50 л.4-7.

② 同上书，第28—29页。

的幸福：获得荣耀、健康和长寿、时代的财富。”^①

在谈到中国的儒教历史时，西维洛夫写道：“当前中国盛行的儒教正如这个国家本身一样，无法确定其诞生的准确时间……在各类被称为《经》的古籍中，无法找到关于神的存在的具体论证，没有关于神迹和神谕的记载，也没有关于创世纪的一切。古代的中国人将‘超自然存在’视为天地的主宰，福荫子孙的万民之父，其意志是不容违背的。他们将其称为上天。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地域根据自身的需要有专属的祭神礼制。虽然自古以来中国人始终在遵守上述法则，但需要指出的是，自近代以来，他们也在不断扩宽自己对神的理解，甚至与我们一道，加入了对过度崇拜和多神论的讨论。”^②

综上所述，西维洛夫论及了儒家思想的根源和基础、儒家经典著作及其核心要义、儒家思想的发展历史、中国人对神的理解等。由此可见，西维洛夫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已经深入其精髓。同时，从行文中不难看出，西维洛夫本人赞同并提倡这种思想，这也应是他一生积极翻译相关中国典籍最主要的动因。

2. 西维洛夫对道家思想的研究

在《中国儒释道三教简述》中，西维洛夫还非常关注中国哲学家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他写道：“我在1826年完成了《道德经》的翻译，但目前还仅是手稿。”^③西维洛夫认为：“老子的哲学在很多方面与中国社会主流思想是相矛盾的、冲突的。但如果从老子本身的思想出发，而不是仅关注字面意思，那么我们会发现，老子有着卓越的、令人惊奇的、儒教所缺乏的智慧，即便老子的学说在中国要排在儒教之后。老子哲学追求的是简单和真理。老子在全书中强烈批判了‘伪’。在老子看来，‘伪’即为谎言和欺骗，除此无他。‘伪’的本质是为恶

①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СПб.) (РНБ). Отдел рукописей, ф. 608, оп. 1, ед. хр. 50 л. 28-29.

② 同上书，第4—7页。

③ 同上书，第36页。

披上善的外衣，并希望以此获得别人的尊重。即便‘伪’不直接表现为（伪）善，也至少努力表现为（伪）善。因此，老子建议大家抛弃这种本质不是善而是虚无的‘伪善’，不用‘伪善’欺骗自己和他人，也不要故作‘伪善’，因为如果这样做，不可能带来任何好处，只能带来恶果。因此，老子倡导抛弃一切谎言，追求真理和真相，只有这样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尊严和幸福。”^①

在论述《道德经》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本质时，西维洛夫强调指出：“老子对神、神的本质、神谕、神对善和恶的褒奖与惩罚，对永生，对死后世界的认识是异常深刻的。如果说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其对上帝、神旨及圣子的学说而震惊后人的话，那主要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距离希腊很近，他们与犹太人的国家关系密切，可以从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中获得上述认识。但老子没有这样的条件，他完全靠自己的智慧达到了甚至连希腊哲学家们都无法企及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子才是多神教背景下第一个对三位一体、一神教有明确认识的哲学家。”^②

西维洛夫还这样总结老子的观点：“对于善事和益事，人们往往趋之若鹜，但其实是出于自私自利的虚荣目的。老子指出，这种情况下，应该做到‘无为’，就是不去做上述的事情……如果从字面意思上看，似乎老子不希望人们去做善事，做好事。但如果从人的动机出发，无为指的是人应该基于内心的纯净和善良，去默默地做善事，做好事，而不是为了把自己的善展示于人前，以此获得荣誉。一些中国学者将老子至善至美的思想理解得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老子不鼓励人行善，反对科学，而科学才是一切美德和知识的源头。但这样的人没有注意到，老子在很多著作中都提倡科学，提倡善行。”^③

①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СПб.) (РНБ). Отдел рукописей, ф. 608, оп. 1, ед. хр.50 л.37-39.

② 同上。

③ 同上。

从上述对老子和《道德经》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西维洛夫对老子有着不同寻常的关注与偏爱。他不仅从汉语全文翻译了《道德经》，他还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展开论述，既深刻阐释了老子思想的精妙之处，又融入了自己对《道德经》的理解。

综合以上西维洛夫对儒家学说和老子思想的阐述可知，西维洛夫是一位深谙中国哲学要义与精髓的汉学家，他的贡献并不局限于译介中国古代典籍，他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源研究透彻，并将其介绍到俄罗斯，让俄罗斯人能够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思想。

二、西维洛夫的《大学》译本

西维洛夫非常推崇《大学》，赞同《大学》系四书之首，其中包含了儒家政治哲学最根本的思想，是理解中国经学的钥匙。因此，西维洛夫先后翻译了三次《大学》，依照的中文底本都是朱熹的《大学章句》。

第一个译本完成于1828年，当时他正在中国跟随第十届北京传教士团。此译本并没有出版，目前以手稿形式保存于喀山联邦大学科学图书馆的手稿善本部。第二个译本和第三个译本分别完成于1840年、1841—1842年，此时西维洛夫已经回到俄国，在喀山大学工作，担任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的负责人，成为俄国第一位汉学教授。在喀山大学工作期间，西维洛夫有了大量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对1828年译本进行了更正和修订。1840年、1841—1842年两个译本都是全译本，但遗憾的是当时也没有出版，目前两份手稿均保存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

直至2012年，西维洛夫1841—1842年的手稿才由科布泽夫首次发表在杂志《东方文苑》上的《〈大学〉在俄罗斯的传播》^①一文中。随

^① Кобзев, Артем Игоревич. “Путь” Великого уч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осточная коллекция 4 (2012): 43-52.

后,2014年,西维洛夫1828年的手稿^①也发表在科布泽夫的专著《儒家经典与名家学说》一书中。本文将以这两个已经出版的译本为依据,探讨西维洛夫《大学》译本的翻译策略,对其译文的语言特点进行分析。

(一) 对中国先秦哲学概念的准确翻译

《大学》中含有大量的中国哲学概念,如“明德”“诚意”“格物”“修身”“齐家”“治国”等。其中每一个概念都蕴含着深刻的中国哲学思想。在西维洛夫的两个译本中,这些概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准确的翻译。我们在这里列出了十个“传”的主题概念,具体翻译对照情况如下表。

表1 西维洛夫《大学》译本中国哲学概念翻译对照表

核心理念	1828年译本	1841—1842年译本
明明德	просвещение разум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умственных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新民	обновление народа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обновление) народа
止于至善	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ебя на верховном благе	поставление себя на верховном благе
本末	корень (основание) и вершина	низ (основание) и вершина
格物致知	снискание познаний состоит в точном и ясном разумении вещей	снискание ясного разума в вещах дабы возвести свои познания на высшую степень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诚意	стараться учинить мысли свои истинными	правильное мышление
正心修身	исправление сердца и улучшение себя	исправление своего сердца и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самого себя
齐家	благоустройство своего дома	приведение своего дома в благоустройство
治国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водворение порядок в царстве
平天下	водворение мира внутри империи	настать мир в империи

① 手稿由喀山大学副教授、汉学家德·叶·马丁诺夫(Дмитр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Мартынов)转写。

由表1可知,两个译本的中国哲学概念翻译都是准确的,1841—1842年版进行了一定修正。修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词汇选择上有了一定的变化。例如,“明德”在第一版中译为了“разум(智慧)”,在1841—1842年版中译为了“умственны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智力能力)”,使“明德”的概念更加具象了。“新民”在1841—1842年版中除保留上一版的“обновление(使变新)”之外,还附加了“образование(教育,塑造)”,也同样具有细化概念内涵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41—1842年版对“格物”这个非常重要的儒学概念有了更为准确的翻译方案:“возвести свои познания на высшую степень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将自己的学识提升到最高的完美境界)”,通过“высшая степень совершенства(最高的完美境界)”准确传译了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对“格物知至”的阐释。同时,1841—1842年版更注重对原文动词细腻情态意义的传达。如1828年版中“止于”翻译为“остановление(停止)”,而在1841—1842年版中修正为“поставление(置于)”,由状态倾向意义改为了动作倾向意义,从而能够更好地传达原文“以至善为最后的目的,定要做到,不半途而废”的内涵。

除这些“传”的主题概念外,西维洛夫对其他中国哲学概念的翻译也非常传神。如:将“仁”译为“оказывать любовь(给予爱,1828)”和“человеколюбие(博爱,1841—1842)”,将“让”译为“быть благоснисходителен(宽厚仁慈,1828)”和“вести себя с покорностью(顺从,1841—1842)”等。

(二)对典籍和名人名言的详细注解

《大学》中引用了很多典籍中的辞句,如《尚书》《诗经》等,还引用了孔子、孟献子、曾子和程颐的名句。翻译这样的语句时,西维洛夫在保证语义基础对应的情况下,在三个方面做了积极的尝试,以求得到更好的翻译效果,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原文的内容。

一是根据语义,将原文中注释性的语句通过添加引导词的方式译出,避免俄语读者产生困惑或不解。如在第一部分“经”结束之后,

两个译本均以注解的形式附上了朱熹的话，其中1841—1842年译本的注解如下：

译文：[Примечание]: В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ей первой главе все изречения, по моему мнению, суть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ума Конфуция, Цзэн-цзыем высказанные; в следующих же 10 главах мысли принадлежат самому Цзэин-цзы, собранные в записках учеников его. В древних свитках письма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были перемешаны, но ныне, следуя тому, как Чен-цзы определил, я по тщательнейшем пересмотрении текста расположил их в другом порядке, как показано ниже. —Примеч. Чжу-си

对照译文还原后的原文：【注解】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注：朱熹”。

二是将原文中的隐藏信息译出，扩展译文的信息量，使信息传递更为全面。如1820年译本的第1章（“经”）：

译文：В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Шу Дзина, Ди дьянь называемой, еще сказано, что «Он (то есть государь Яо) мог просветить свои высокие способност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сии мужи могли просветиться.

对照译文还原后的原文：帝典，又名书经，曰：他（即尧帝）克明俊德。皆自明也。

在这句译文中，西维洛夫首先将《书经》（《尚书》别称）补充译出，其次，西维洛夫还增补了“克明俊德”的主语，即尧帝，以便俄语读者能够理解这部分的核心内容。同时，作者在译文中多次以括号的形

式指出某些语句的出处，如出自1841—1842年译本第9章（“传九”）的示例：

译文：В «Кан-гао» сказано: Как будто бы убаюкивает дитя (т.е. ласково обходится со вверенными его попечению людьми), со всем усердием (прибавляет Цзэн-цзы) изыскивая к тому средства, от хотя и не вполне попадает на мету, однако ж недалеко от нее отступает. Не прежде учатся кормить детей, а потом выходят замуж.

对照译文还原后的原文：康诰曰：“如保赤子”（善待受他照料的人们），心诚（系曾子之言）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在这段话的翻译中，西维洛夫首先以括号注释的形式阐释了“如保赤子”的语义内涵；随后他再一次以括号的形式指出这句话是出自曾子之口，提升了译文内容的严谨性。

三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将典籍的修辞特色翻译出来。1841—1842年译本在翻译《诗经》中的句子时，通过添加语气词、使用形象生动的形容词以及感叹句来表达《诗经》中双声叠韵的音律美。如1841—1842年译本第4章（“传三”）中这样翻译原文对《诗经》的引用：

原文：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

译文：В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х» сказано: О! глубокомысленный Вэнь-ван! Ты столько же был славен, как и внимателен к тому, на чем должно 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ся!

在这段翻译中，译者首先使用了语气词“O！（啊！）”，非常生动地传

译了《诗经》情感饱满、可用于吟唱的修辞特点。随后继续用两个感叹再现了原文强烈的情态意义。

（三）对语境中逻辑语义的显化

古文句内与句际之间的逻辑语义衔接，并不主要由连接词来完成，而是更多地以意合方式出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依据上下文自己判断其中的逻辑联系。《大学》原文篇幅较短，言简意赅，其中的大多数逻辑关系均是隐性的。西维洛夫在翻译时，经常会将原文语境中隐藏的逻辑关系增补译出，便于俄语读者理解原文的逻辑关系，避免产生误解，使译文变得通顺易懂，符合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如1841—1842年译本第10章（“传九”）中的这段：

译文：Государи Яо и Шунь управляли империей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человеколюбия, и народ им повиновался. Цзе и Чжоу управляли империей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бесчеловечия, и народ также им повиновался. **Но** когда от сих последних выходили повеления, противные их главным расположением сердечным, тогда народ не оказывал им послушания: по сей-причине любомудрый муж что сам имеет, то **только и** требует от других, а чего сам не имеет, того и не взыскивает с других. **Ибо** статья не может, чтоб тот мог научить других, в душе которого скрываются расположения не приятные. Итак, водворение порядка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зависит от приведения своего дома в благоустройство.

对照译文还原后的原文：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但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仅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因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在本例中，西维洛夫在翻译的过程中添加了逻辑连接词“но（但

是)”和“ибо(因为)”,使原文的语境语义得以明确表现出来,降低了读者的阅读难度。同时,他还使用“только и(仅仅)”强化句子逻辑,将原文既顺承又加强的语气准确翻译出来。这样的例子在两个译本中还有很多。在翻译古文时,要将原文的逻辑关系准确显示出来,对译者的古汉语水平要求很高。从这段翻译中不难看出,西维洛夫对《大学》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他能够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

除以上的共同特点之外,两个译本由于时间上的差异,译本语言风格的变化也是比较明显的。相较之下,1828年译本更接近阐释型科学译本,即译者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调整语序,适当增删个别词汇,或将原文语义以更为意译的方式翻译出来,译者参与度较高,译者印迹较为明显。相较之下,1841—1842年译本则更加学术化,语言更为简练,对原文的语义几乎不做增删,且几乎不调整原文语序,尽量以近乎白描的方式翻译中国典籍,科学性和严谨性更高。

纵观西维洛夫翻译的两个《大学》译本,我们可以发现,西维洛夫对中国文化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这种了解不限于懂汉语、能翻译,更是带有学术色彩的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内核的深耕与钻研。

西维洛夫晚年在极度贫穷中度过,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翻译和研究工作。西维洛夫最后的手稿是被科学爱好者偶然从修道院装修时清理出的废物中发现的。^①虽然西维洛夫的中国宗教哲学研究之路充满了坎坷与波折,但他对这些经典著作的理解与翻译具备了高超的水准。而且必须要指出的是,西维洛夫翻译的四书虽然在19世纪没能正式出版,但他将其列入了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的《汉语教学大纲》,他在《大纲》的第7条中这样写道:“(应设置)中国古籍翻译课程,如五经,孔子哲学、《孟子》、带有朱熹注解的四书,其中四书被誉为中国古代智慧和教育的最高典籍。课程用到的中国古文素材还包括张阁

^① Хохл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итаист Д. П. Сивиллов и его русские переводы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ки.”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44.1 (2014): 504.

老为明朝统治者编撰的中国通史材料，以及其他有价值的好书。”^①由此可见，西维洛夫在喀山大学为具备一定汉语基础的学生讲解四书，他是俄国将四书引入大学课堂的第一人。随后，西维洛夫将其翻译的四书内容收入自编的《中国文选》，并将其继续用于喀山大学的中国文学课教学。

纵观西维洛夫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生涯，比起同时期赫赫有名的汉学家比丘林（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和瓦西里耶夫，我们也许可以用“默默无闻”四个字来形容他。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西维洛夫的学术兴趣点主要集中在中国宗教哲学上。但19世纪的中俄关系，与17—18世纪相比，发生了急剧变化。如果说17—18世纪的俄国在接触中国文化时，主要是以借鉴和引进为主，那么19世纪以来，随着鸦片战争爆发和《瑛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签订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俄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由和平共处转为了掠夺侵略，相应地，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也由学习借鉴转为实用主义。19世纪的俄国更需要懂汉语和了解中国地理、经济、民族、教育等国情知识的人才，而对深邃的中国宗教哲学思想则鲜有人关注，这类研究成果也很难得到政府的出版支持。即便西维洛夫本人和他的译文评审者汉学家沃伊采霍夫斯基（И. П. Войцеховский，1793—1850年）多次向校方强调四书等古籍译本的出版对俄国大学汉语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最后这些书仍然没能如愿出版。在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存在的19年（1837—1855年）里，学生数量逐年递减，毕业生普遍面临就业艰难的窘境，这种情况到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成立以后的瓦西里耶夫时期也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好转。

^① Хохл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итаист Д. П. Сивиллов и его русские переводы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ки.”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44.1 (2014): 507.

三、西维洛夫《大学》译本在俄罗斯的传播

1837年，西维洛夫将四书写入俄国第一个《汉语教学大纲》，这不仅开辟了19世纪《大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之路，同时标志着《大学》正式进入了俄罗斯大学汉语教育领域，逐渐为一代代汉语专业学生所熟悉。

西维洛夫在喀山大学任教期间，他为已经学习过一段时间汉语、具备汉语基础的中高级同学讲解《大学》，使用《大学》的汉语文本进行汉译俄练习，同时还在中国文学课上讲解《大学》所包含的中国政治哲学要义。1840年，西维洛夫编撰了《中国文选》（*Хрестоматия Китая*），将《大学》等重要的儒家经典纳入其中。他非常希望能够尽快出版这本书，以用作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的正式教材。但这本书的命运非常坎坷，它曾交与俄国著名汉学家比丘林审阅，比丘林高度评价了这本书：“这是俄罗斯的第一本中国文选，其前言部分对汉语内部结构的解读有理有据。这部分论述值得推荐给整个欧洲”^①，并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西维洛夫按照修改意见进行了修订，随后又把《文选》交与汉学家沃伊采霍夫斯基审阅。沃伊采霍夫斯基对《文选》赞不绝口，他回信给穆辛-普希金，首先高度肯定了《文选》的教学和学术价值：“西维洛夫的《四书》俄译本内容准确，语言精炼，这种译本是非常罕见的”，其次他高度评价了西维洛夫的翻译水平：“丹尼尔（西维洛夫的法号）的译文高度符合汉语原著思想。但在译文努力以最正确的方式表达出汉语思维的同时，并没有偏离俄语文体风格。无论是挑刺的文体批评家，还是语言学家，都不能不说译文表达符合标准的俄语文体风格。如果西维洛夫这部伟大的著作（《文选》）能够以俄语

^① Скачков, Петр Емельянович.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Наука, 1977.

出版，那么它一定会成为汉语学习者的经典教材”。^①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文选》几经审阅和修改，并得到了审稿人的大力推荐，但由于种种其他原因，终究未能正式出版，仅以讲义的形式在教学中使用。

在西维洛夫辞去喀山大学的教职后，沃伊采霍夫斯基继续使用这本书给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并同西维洛夫一样，在翻译课堂上使用《大学》等儒家经典作为汉译俄的素材。1855年，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停办，全部老师和学生转到了圣彼得堡大学，成立了东方学系。瓦西里耶夫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执教期间，一方面沿用了西维洛夫《汉语教学大纲》中的大部分内容，继续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大学》等儒家经典；另一方面自己执笔编撰了新的《中国文选》，但其中借鉴了很多西维洛夫版的内容。^②瓦西里耶夫编撰的《中国文选》很快正式出版，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本中国文选著作，获得了巨大成功。在瓦西里耶夫1900年去世后，彼得堡大学中文系仍然继续使用过该本经典教材。^③

由以上历史可知，《大学》译本在19世纪俄国大学的汉语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俄国汉学领域的师生均有机会阅读到《大学》译本（主要应为西维洛夫译本），并能够有机会较好地掌握其中的语言知识和中国哲学思想。可以说，在19世纪的俄国，《大学》以及其他儒家经典译本不仅在大学教学中得到了良好的传播，同时也对俄罗斯汉学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杰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西维洛夫的《大学》译本虽然未能公开出版，但也完成了其重要的教育使命，实乃在逆境中独辟蹊径。

① Хохл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итаист Д. П. Сивиллов и его русские переводы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ки.” *Обще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Китае* 44.1 (2014): 498.

② Скачков, Петр Емельянович.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③ Петухова, Наталья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Развити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как науки в России в середине-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и африканистика* 4 (2014): 15–22.

结 语

作为俄国的大学里首个汉语教研室负责人、首位汉学教授，西维洛夫全面研究和翻译了大量中国先秦典籍。通过以上对其《大学》俄译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西维洛夫的译本展现出了很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这代表着他对《大学》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政论功能转向了对中国政治哲学的深刻思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西维洛夫的译本虽然没能以公开出版物的形式面向大众读者，但得益于他在大学汉语教育方面的工作，《大学》成为了俄国大学首个《汉语教学大纲》所列课程的必读书目，在喀山大学期间被用作翻译课和文学课的教材。这种以教材和课程形式固定下来的传播方式虽然受众主要局限于大学师生，但为《大学》在俄罗斯的持续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西维洛夫的《大学》译本，尤其是1841—1842年的译本使俄罗斯汉学界能够有机会了解到四书以及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内涵，对增进两国文化交流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